

BUND PARK

日常叙事中的现代、后现代理论批评

恐慌岁月写作「救赎」，艾略特隐秘情史，译食经苦乐香鲜……

三十年光影辗转腾挪，文化摆渡者中西畅游

# 外滩公园

裘小龙虚构批评随笔集

裘小龙 著

论金庸、悼故人，谈写作之缘起

四川文艺出版社

B U N D P A R K

# 外滩公园

裘小龙虚构批评随笔集

裘小龙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外滩公园：裘小龙虚构批评随笔集/裘小龙著。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3  
ISBN 978-7-5411-5324-2

I. ①外… II. ①裘…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21705 号

WAITAN GONGYUAN; QIUXIAOLONG XUGOU PIPING SUIBIJI

外滩公园：裘小龙虚构批评随笔集

裘小龙 著

策 划 刘芳念  
责任编辑 苟婉莹 刘芳念  
封面设计 叶 茂  
内文设计 史小燕  
责任校对 蓝 海  
责任印制 唐 茵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勤德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6 mm×210 mm 开 本 32 开  
印 张 6.5 字 数 160 千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9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5324-2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028-86259301

## 自序

在这本集子中收入的文章，基本上都是我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起，在美国开始用英文进行小说创作后，用中文写成的；也有一部分是先用英文写的，后来又改译或改写成了中文。

也许多少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在美国圣路易华盛顿大学读比较文学博士课程的日子里，接受的是学院派的训练，后来却因为种种因素，没有沿着写学术论文这条路走下去，转而开始了用英文进行文学创作。回想起来，或能追溯到卞之琳先生在许多年前对我的影响。于我而言，他首先是诗人，然后才是学者和翻译家；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跟他读英美文学硕士研究生时，每星期在他东四干面胡同的家里，谈得更多的往往是怎样写诗及小说，也正是在他的鼓励下，我开始了中文创作。

但也许更有讽刺意义的是，当我后来用英文写起了陈探长系列小说时，我却又开始时不时地用中文写些不那么学院派的文章。一方面是在主观愿望上，不想就此扔掉了自己的中文，而在不同的语言背景中交替写作中，两种文字的感性也会产生些有意义的互补和融合；一方面是在一本接一本小说的写作中，与学院派的风格固然是渐行渐远，自己也确实没有足够的精力再去写长篇的、正儿八经的学术论文；还有一方面，则是受到了原先未曾想到的一些影响。

首先应该说虚构批评（Fictocriticism）的影响，二〇一〇年左

右，我去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任短期客座教授，与大学英语学院的史迪芬·缪克（Stephen Muecke）教授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学术交流活动。他是虚构批评的一个领军人物。作为一个后现代的新批评潮流，把故事、批评、理论的写作融为一体，虚构批评这些年尤其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有了长足发展。史迪芬·缪克送了我一本他自己的短篇集子《在安特曼群岛中的乔》（*Joe in the Andamans*），在接下来的几天中，我有不少时间都是趴在悉尼的海滩上读这本书。Fictocriticism 是一个合成词，从词前半部 Ficto 的组成看，有虚构（写作）的意思，后半部 criticism 则指的是批评理论。在我们后来的探讨中，史迪芬·缪克给我发过一个电子邮件，为虚构批评作了一个特别简明扼要的定义，“在讲一个故事的同时，展开一个论点”（telling a story and making an argument at the same time）。

确实，他的批评专著读起来感觉就是不一样，举重若轻，叙事生动，充满了栩栩如生的细节，就像作者坐在你前面，絮絮而讲日常生活中的故事。书名中的乔是他的儿子，父子有一次同去安特曼群岛，他们在旅途中的一幕幕现实场景轻巧、幽默地印证了作者所要证明的论点，好几次都让我忍俊不禁，但又发人深思。说到底，现代或后现代的理论批评放到了日常叙事中，自然而然地加以阐发、论述，读的时候就不同于那些抽象、枯燥、艰涩的理论著作，处处堆砌着生造而佶屈聱牙的词汇，好不容易读完了却还似在云里雾里。

史迪芬·缪克的虚构批评我之所以读得津津有味，自然也有可能是与我自己这几年侧重（虚构）小说写作有关，觉得他那种讲故事一般的文学理论批评更读得下去，至少是在自己身上引起更多的反响和共鸣。

我于是尝试着把自己的一些批评文章也放在日常生活场景的叙述中展开，仿佛像在讲一个个故事。这些文章也许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批评，也不算泛泛而写的散文或“美文”，一般还都有自己要想阐明的或很难在学院派文章中阐明的观点在内。在中国的传统批评中，有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不同写法，这两者其实也可以互补，没有必要一定去划分得那么清楚，虚构与批评也一样。

不过，这本集子中的文章也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虚构。这是因为在中国发生的事，写在中国发生的事，常常让我想到《红楼梦》中的两行诗，“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在我们日常现实中发生的事似乎更多虚幻或虚构的感觉，而且还常是在一些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真假有无之间，充满了中国特色的荒谬，真真假假、匪夷所思。在今天的中国，真实与虚构的界线正变得越来越模糊。因此在这些文章中写到的人与事或所谓的故事，基本上都是真实的，只是我多少用了写虚构作品的笔法在写。

无须赘言，集子中并非每一篇文章都是刻意作为“虚构批评”来写的，读者也没必要一定要这样来读。从文类上说，关于其中一些文章的安排，自己有着故意的混杂在内。这里不妨再引用史迪芬·缪克在他那本批评集子的“引言”中说过的一段话：“虚构批评自然是个很大的范畴，也只能如此——如果说它的写作灵感是来自身边的事物或情景。人们不妨对感兴趣的作家强调说，别觉得他们的写作一定必须要符合另外一个模式的规范，而是要有信心，他们面对的情形中所特有的问题，会出乎意料地使他们改变写作方法。”

这里还应该提到几位朋友这许多年来对我的鼓励和帮助。尤

其是陆灏先生，他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督促、鞭策我继续用中文写这些东西，有时他甚至什么都不说，就从国内发个电子邮件过来，告诉我一些他认为有意思、值得写的人或事或题目。从《文汇报》《文汇报读书周刊》《万象》到《上海书评》，他是一路披荆斩棘地编下来，我也只能一路举步维艰地跟下来，很多篇还真都是这样写成的。尤其是金宇澄先生，记得在巴黎离奥蒂翁剧院不远的一家餐厅里，他举着一杯红酒，神情特别严肃认真地对我说，希望我能为更多的中文读者也写些故事（或许只是巧合，他常把这些文章说成是“故事”），回去后还特地发了个电子邮件，把餐桌上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还有一位，杨之水先生，那还是我在八十年代末出国之前，她作为《读书》杂志的编辑（她当时与我通信的名字是赵丽雅），编我的稿子，决定要用了后，却又给我写了一封信，说她看我的诗写得激情洋溢，看我的文章却写得十分拘谨、放不开。这是我始终没忘的一番批评，不知道过了这许多年，现在这些写得像讲故事一样的文章，是否或多或少放开了一些。自然，还有四川文艺出版社的刘芳念先生，是她建议我把这些稿子编起来，考虑结集出版。

在这本集子里的文章，基本上是按写成的时间排列的，但因为有些后来有较大的修改，也因为有些是从英文改译成中文，时间的顺序也很难说就一定那么分明的。

这些文章终于放在一起了，自己再看一遍，好像也聊备一格，或许可以名之为“中国虚构批评”吧。

## 目录

自序 1

转折点 1

外滩公园 3

卢华侨 14

从澳大利亚到中国的虚构批评 51

经过阳光经过雨

——悼也斯 60

哥哥晓伟与陈探长 68

傅好文镜头中的上海 72

艾略特的情诗与情史 77

风起，唯有努力生存

——悼陆谷孙先生 85



|                   |     |
|-------------------|-----|
| 佛事、路易·威登          | 91  |
| 第一次获得的自信——写作      | 100 |
| 英文中难念的中文食经        | 109 |
| 叶芝、杨宪益、“1916年复活节” | 120 |
| 斯蒂芬·斯彭德的《中国日记》    | 128 |
| 敏姨                | 138 |
| 雁背夕阳红欲暮           | 154 |
| 雪泥鸿迹              | 166 |
| 任作君先生             | 170 |
| 金庸先生              | 180 |
| 《天南》采访            |     |
| ——一次关于创作的访谈记录     | 188 |

## 转折点

据说，保尔·瓦莱里曾试图接近一位无法接近的已婚妇人，在他绝望的努力中，诗人却来到了自己诗创作的一个转折点。有不少文学批评家不同意这个假设。我对此也持保留态度，至少在一篇论文中。

多年前的一个冬日傍晚，我在出差途中来到了山东泰安。这可是一个去爬泰山的难得机会。在泰山顶上看日出，是中国古典诗词中一再歌之颂之的主题。当天夜里，我就开始登山。半路上，我遇到四五个老妇人，准有七八十岁了，在陡峭的山径上，拖着她们曾裹过的小脚艰难地前行。她们头围白毛巾，身穿黑土布衣服，看上去仿佛比夜色中的乌鸦更黑。我与她们互打招呼，听口音她们是当地人，我对她们有些感动得惊讶了——年纪这么大了，走路这么困难，还在这么漆黑的深夜攀登。她们告诉我，她们不是去看日出，而是去山顶上早香——香越早，心越诚，所以只能半夜爬山。泰山上有什么著名的佛寺或道观，我没听说过，她们也没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山上有一个叫泰山老奶奶的神祇，她们倒是异口同声地坚称。泰山老奶奶在哪里？说不清楚，但就在山上。属于道家还是佛家？这问题实在无关紧要。不管怎么说，泰山老奶奶神通广大。今年意外的好收成；家里又添了个孙子，尽管有政府的独生子女政策；新配一副假牙，还咬得动隔夜的冷馒头……所有这一切，都是托泰山老奶奶的福。

我听着，但找不到什么可说的，夜鸟聒噪地从我们头上掠过，

我加大步子，没多久就把她们远远落下了。

终于来到山顶招待所时，已过了午夜。可能因为山上的潮气，招待所里大通铺的床垫子都湿漉漉的，睡上去很不舒服。不过，想到那些进早香的老妇人，此刻还在崎岖的山路上一步步“爬行”，心里多少也释然了。我其实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很快，睡意征服了我。

第二天醒来是阴天。泰山看日出不可能了，我失望地在玉皇顶附近兜了小半圈，试着稍稍安慰自己一下。或许，在这里看日出与在其他地方看，没有太大的区别，也不见得一定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只是这么多诗人写了，自己也就信了。

快下山时，却意外地看到那些老妇人跪在一个小山洞的洞口，我不禁俯身也向山洞中探头望进去。我端详了好一会儿，才在山洞内壁上依稀辨认出一些似乎是画着的粗线条，好像勾勒出一个老奶奶的样子。山洞其实挺浅的，这些线条也很可能是风雨留下的痕迹。我在后面站了七八分钟，但她们跪在那里不停向泰山老奶奶磕头，压根儿没注意到我。

此刻，我的小外甥，仿佛是从电视机中一大步跨出，变成了威风凛凛的黑猫警长，在死寂的广场中发疯。他斜戴帽子向我冲来，手中的玩具冲锋枪开始胡乱扫射。我被一路逼到书架前，再无退路，只能举起手投降。

## 外滩公园

我的陈探长系列小说中有好几本写到了外滩公园，尤其是第二本《忠字舞者》，小说的开始和高潮部分都放在这个令人留恋的公园里。其实，我在八十年代写的一篇中文短篇小说《同一条河流》，也提到了外滩公园。

妻子在看了《忠字舞者》后，若有所思地说：“你至今还没有走出外滩公园。”

今年三月我在法国接受一家电台采访，提及小说中种种关于上海细节的描写，突然又想起了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如此灿烂，正是因为普鲁斯特在不懈的回忆中，将重新捕捉到的过去时刻——尽管原来或许平凡、或许暗淡——提升到一个赋予了全新理解、并充满感性激情的高度。就这点而言，乔伊斯同样突出，他身居异乡，一辈子都在写他当时回忆中的都柏林。

所以，我回忆中的外滩公园是七十年代初的。

那是在一九七一年，我是六九届的“病休青年”或“待业青年”——全称应为“因病在家休养等待分配的知识青年”。在史无前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上海六八届以后的中学毕业生陷入了“一片红”海洋，即全部都必须要响应号召，戴着红花、唱着红歌、跳着红舞去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只有一些能成功找出、并证明身体上有这种或那种疾病的应届毕业生，才得以漏网而留在城市中“病休”。从当时的政策规定来说，“病休青年”病养好了，还是要去农村的，不可能永久留在城里，

因此不时需要到医院复查是否已经康复，再由知青办公室决定分配去向。“等待分配”是一场充满波折、前途难测的持久战，像等在一条看不到尽头的黑漆漆隧道中，很可能要十年八年地耗下去。

怎么办？我与几个朋友商量，一时心血来潮，决定要结伴去外滩公园学太极拳。公园五人中，钱君与万君是与我“同病相怜”的病休青年，萍女士从六十年代中期就开始待业，当时刚离异，早晨去公园只是想散散心，俞君是唯一有份全民工矿工作的幸运儿，他的工厂就在九江路靠近外滩的转角上，离公园近，打完拳正好去上班。

于是，我们一清早就出门去公园，“也可以算是闻鸡起舞吧”，我开玩笑说。那个灰蒙蒙的早晨，我们经过的一条僻静的小街上还真能听到鸡叫。（“文革”的年月里，上海市场上的鸡蛋都要凭票供应，尽管里弄居委会干部一再上门动员杀鸡，市中心养鸡的人家也不在少数。）

那些日子的外滩公园显得空荡荡的。除了公园最初落成时修建的几个亭子和一条蔓着常春藤的长廊外，其余就是绿色的长凳了。凭栏眺望暗黄的江水，倒是一片开阔。近公园后门处有一栋简陋的两层建筑，好像是办公室，门口的海报有时也会告诉公园的游客，里面在办什么阶级斗争展览会，但我们从未进去参观过。还留给人印象的是无处不在的高音喇叭，挂在电线杆上，悬在树丛中，一大清早先向粮地播一遍广播体操音乐，然后就是一遍又接着一遍的新闻联播。除了打太极拳的人，公园的早晨几乎看不到什么其他活动。打太极拳的人大多数是已退休下来的，倒是有好几个班，都属于自发组织起来的，授课的老师不收费，也很热情，只是对我们这些中途加塞者来说，学起来多少有些困难。我起初还坚持着练，但进步甚小，没多久，就因为一个意外，放弃

太极拳而改学英语了。

对此，小说《忠字舞者》的开始部分有这样一段描写：

外滩公园充满了魅力，更因为种种历史的联想让人神往。早在小学年代，陈超就读到了关于公园的传说。当时的教科书里做了这样一段描述：在二十世纪初，外滩公园只对洋人开放。红头阿三凶神恶煞似的守着公园大门，门口竖一块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一九四九年后，政府认为这是一个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题目，于是编写进了中小学课本。但这究竟是历史还是虚构，他许多年后反而搞糊涂了。他曾在上海图书馆查找了一个下午的资料，仍不得其解。按照新历史主义的说法，其实只有很细的一条线在间隔历史的真实与虚构，彼此不断让权力的解释混淆起来。

他沿着台阶走到江边，晨雾仿佛用过去岁月的指尖轻抚着他的脸庞。白鸥掠过水面，亮晶晶的翅膀在灰色的晨曦中闪烁，像从一个已忘却了的梦中飞起。黄浦江与苏州河的分界线在他的凝视中渐渐清晰。

对于陈超来说，这个公园的吸引力，更多是来自一个个人原因。

在七十年代初，作为一个病休待配青年，不上学，也不工作，他曾来到公园练太极拳。他没有像他朋友所预期的那样，成为一名武术大师。他只是心不在焉地练了两三个月后，在一个雾蒙蒙的早晨，意外地在公园的一条长凳上发现了一本旧英语课本。这本书怎么会到这里来的，他始终也没琢磨出来。公园的长凳常沾有湿漉漉的露水，游客有时会用旧报纸铺在坐的地方，但是从来没有用书的。在随后的一个星期

里，他一直随身带着这本书，希望有人来把书领回去。没有人来。几天后的一个早晨，他怎么都练不好一个太极拳姿势，感到沮丧，就随手翻开了这本书。从此，也翻开了他病休生涯中的新一页，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几乎每个公园早晨都看到他在那里学英文，在那棵柳树下，手捧课本，柳枝在头上飘拂，似乎想系住未来的信息……

多少年后回顾起来，生活真是充满了阴错阳差，如那本神秘的被遗忘在长凳上的英语课本，如当年偶然捡起又翻开这本书的青年。一件事引出另一件，然后再是一件，在一长串复杂的因果关系中，最终的结果已经很难辨认出最终的起因。这也许比他正在翻译的西方侦探小说所愿意承认的更复杂。

一支轻盈的乐曲从海关大楼上传过来，在四月的凉风中漾过。六点三十分。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是另外一支曲子。

自然，小说中的内容与生活中的内容不能画等号，我对手中还捧着《忠字舞者》的妻子说。这其中的似是而非或许是既搞创作又搞批评的人更能体会到的。艾略特写《荒原》，其中肯定有来自他个人生活中的材料，如第二章中那个无聊而又神经质的女人的独白，据考证就是他第一个妻子维芬的原话。然而，谁又能这样来读《荒原》呢？这与曹雪芹不能替代红学是一样的道理。

也许我们可以说，艾略特的非个人化文学理论，即将生活感受的人与艺术创作的人完全分开的理论，多少有着矫饰的成分。不过，一个作者在写作时，纵然是彻底沉浸在回忆中写作时，却也可以在难以尽数的意识、潜意识因素的影响下，对原始生活素材加工、变形、扭曲、删改……

所以，这只是小说，我对妻子总结说，因此，这只是虚构。最后，我还不得不过来尝试一番“自我解构”，向她交代当年自己“非虚构”生活中的几个真实外滩公园场景，这有点像成龙功夫电影那种“画蛇添足”的片尾，加上两三个拍片过程中的镜头——让观众看到功夫明星怎样在拍摄所谓身手非凡的绝技时，却摔得鼻青脸肿。

在《忠字舞者》这本以外滩公园为背景的小说中，有一些素材多少是因小说布局的需要而做了改动，我告诉妻子，特别是从打太极拳到学英语的那个意外的转折点。

当时公园中的那条长凳上，其实并无一本如此神秘的英文课本，但我确实看到了两个在那里学英文版毛主席语录的女孩子。看上去大约也是病休青年，不是每一天都来，但来的那些日子，她们经常会捧着书一直学到十点多钟。接着，我又看到一个身材魁梧的老者，天马行空似的在那里独练一套杨式简化太极拳。练完拳，他有时会径自走过去，坐到那两个女孩子坐的长凳上，开始指导她们学英文。我突然受到了震动。说到底，学太极拳并不能解答未来“怎么办”的问题，学英语却或许能。就在这个公园里，两个境况看上去与我相似的女孩子正在这么做。

于是我匆匆赶回家，掘出一本四十年代的《纳氏英文文法》；第二天，在离她们不远的角落里，找了另一条长凳，也一本正经似的学起了英语。

也许我转变得太快，一起去公园学太极拳的俞君闹了误会。他以为我这样做一定是别有动机，其实想去“接近”那两个女孩子，却又表现得书生气十足，太迂回曲折了。他都没跟我打招呼，直接代表我，自报山门，去跟她们套近乎，没想到却碰了一鼻子灰，连她们的名字都没问到。恼羞成怒之余，他索性给她们各自



取了外号，一名“冷若”，一名“冰霜”。当然，这两个外号只是在我们自己的圈子里这样叫。

好在那位身材魁梧的老者也注意到我了。他姓任，是个退休的中学校长。任先生可谓古道热肠，有教无类。他倒并不是一课一课地教学生，而是当我在英语学习中遇到一些问题，自己怎么都答不上来时，才坐下来给我做些解释。稍后，我的长凳上还加入了两个来自虹口区的病休青年，人力和启宇。我们三人组成了一个在任先生指导下的学习小组。

只是不知什么原因，“冷若”“冰霜”却突然再也不来公园了。

还有一些素材是因为没预见到的原因而未能写进书里。如离外滩公园不远的中央商场沙市小吃摊。在我的记忆中，公园的早晨常常是与它连在一起的。去外滩公园，我一般走福州路上四川路，再穿过沙市小吃摊到南京路外滩。对我在那里的晨读，我父母应该说是相当支持的，每天都还给我一角钱的早餐金。沙市小吃摊花色虽少，却定位在为劳动人民服务的低价上。我通常买七分钱一副的大饼油条，偶尔改善一下，会要上二两生煎馒头，也就一角二分，或者一角钱一碗的清咖喱牛肉汤面。没有牛肉，牛肉得另加一角五分，这在病休待配的日子里是不能承受的奢侈，但胡椒和葱花可以免费添加，吃得一头大汗直奔外滩公园。尤其在冬天，这碗面的热量能让人在长凳上多坐一个小时……

这一切记忆犹新，我想很可能得归功于几次失败的努力——为了省下早餐钱去买书的努力。尼克松总统访华后，福州路外文图书店的旧书部开始有所松动，时不时会有“文革”前出版的语言工具书悄悄拿出来。徐燕谋的第七、第八册大学英语教材，都是我那时意外的收获。只是有一次，外文书店的营业员老林从柜台下为我取出好不容易留着的一本 Hornby 的语法专著，我却阮囊羞